论南社的小说创作

——以《南社小说集》为中心

王双腾

（山东警察学院 专业基础教研部，山东 济南 250014）

摘　要：过往的南社小说研究因概念界定模糊而忽视研究对象的“南社性”。《南社小说集》作为唯一刊载小说的南社社刊，是周瘦鹃等南社社员以“南社”之名进行小说创作的唯一平台，同南社社员的其他小说创作相比更具“南社性”。《南社小说集》弥补了《南社丛刻》未能收录小说的缺憾，使南社文学体系趋于完整，收录的小说、小说话新旧杂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呈现出革命情怀与消闲元素相交融的多元风貌。南社中规模不断壮大的小说家群体促成了《南社小说集》的成书，《南社小说集》仅出版一期后便宣告停刊，则显示了南社作为文学社团在组织与运作等方面的不成熟。

关键词：南社；南社社员；《南社小说集》；小说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5）02-0108-09

收稿日期：2025-01-16

作者简介：王双腾（1989-），男，山东济南人，山东警察学院专业基础教研部讲师，文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5.02.006

清末民初，随着周瘦鹃、王钝根等职业小说家陆续加入南社，南社开始在小说界施加自己的影响。南社以社团名义发行的社刊包括《南社丛刻》与《南社小说集》。《南社丛刻》共存 24 集，收录诗 12273 首、文 1571 篇、词 2850 首。《南社小说集》仅出 1 期，收录小说 13 篇、小说话 8 则，虽然体量狭小，但成为南社社员以“南社”之名进行小说创作的唯一平台。

一、职业小说家与南社的相遇

清末，稿酬制度的确立与职业小说家的诞生打破了中国延续数千年的文学生态，不仅为读书人提供了展示自身才华的机会，也使读书人在“义利之辨”中由耻于言利变为卖稿取酬。受制于煮字疗饥、卖文糊口的创作环境，职业小说家不得不迎合读者的欣赏趣味，揣摩报刊书局的市场需求，作品数量则是多多益善。南社成立时，高旭畅“欲一洗前代结社之积弊，以作海内文学之导师”①。柳亚子等南社元老同样坚信“文字有灵”，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引领时代、救国救民。《南社丛刻》收录的作品中，除去感时论事的革命诗文，大多数是文人雅士相聚时的吟诗作赋，题材不出题记、宴游、赠答之类。这些作品对于传统文人而言无非是个人生活中的逢场作戏，如果不是出身江南富户的柳亚子依靠自身财力勉力收集②，散场后便会如过眼云烟，湮没于世。同南社文字救国的立社宗旨与公益性的运作方式相比，职业小说家趋时媚俗的文

①高旭：《南社启》，《民吁报》1909 年 10 月 17 日。

②“30 年历史的南社，若无柳亚子始终负责主持，恐防早成一盘散沙，不可收拾局面。这，并不是说亚子是天神，南社全部社友，无人能及。因为主持南社，是一件耗精神赔钱吃力不讨好的笨事，只有亚子，吃了自己饭，会肯负责担任这种巨大的工作。只有亚子，才有这种才干毅力热心，来负担这种巨大而艰苦的工作。因为别人都有正常工作，不能全力经办此事，而亚子除开报社外，向无其他职务，所以孜孜矻矻，锲而不舍，专心一致来主持南社。”朱凤蔚：《南社影事》，马以君主编：《南社研究》第 6 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99 页。

学理念与卖文取酬的生活方式充满了世俗气息，这使旨在“反抗满清”[①]的南社不屑于吸纳职业小说家入社，为生活奔波的职业小说家则对加入南社、投身革命意兴阑珊。

小说报刊在清末民初成为小说的主要载体与传播媒介。围绕小说报刊，职业小说家形成众多小说家群体。小说报刊的主编拥有选择发表某篇小说或褒扬某位小说家的权力，由此成为小说家群体的核心人物，并与受其提携而成名的后进小说家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王钝根提携周瘦鹃，周瘦鹃提携朱鸳雏、张舍我、张枕绿、程小青，钱芥尘提携李涵秋、贡少芹、张丹斧、冯叔鸾，严独鹤提携程瞻庐、李东埜、施济群、何心冷，都成为清末民初小说界的一段佳话。与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南社元老的意气相投相比，职业小说家群体的维系更多地依赖利益的捆绑。小说报刊的主编只有掌握丰富的人脉资源，才能争取到质量、数量兼备的名家名作，使自己的刊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1915 年 8 月，包天笑创办《小说大观》，自信创作团队“可以算得无懈可击了”：叶楚伧、陈蝶仙、姚鹓雏、周瘦鹃、范烟桥、张毅汉“都是我部下的大将”，毕倚虹“更是我的先锋队”[②]。1917 年，包天笑创办《小说画报》，自言“班底是现成的”，依旧是《小说大观》中的叶楚伧、陈蝶仙、姚鹓雏、周瘦鹃、毕倚虹等人，“有的写短篇，有的写长篇，有的短、长篇都写。”[③]可见，包天笑能够在清末民初小说界纵横捭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丰富的人脉支持——陈栩、姚鹓雏、周瘦鹃、张毅汉、毕倚虹等人，而这些小说家又都是包天笑担任小说报刊主编时提携的后进。小说在清末民初实现高度的商品化后，小说报刊主编与职业小说家之间形成彼此的双向需求：主编需要小说家的供稿维系报刊运营，小说家则需要主编为自己的小说提供发表平台。这种双向需求决定了建立人际关系网的必要性，主编与小说家只有互相扶持才能保证共同利益的实现。由此便以现实利益为基础，形成以报刊主编为核心的职业小说家群体。

职业小说家群体一方面凭借自己掌握的小说报刊“割据一方”，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地交流、互动。与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南社元老为政治信仰而聚集不同，职业小说家虽然不乏爱国之心，对于入幕为官却没有多大兴趣。他们更愿意将精力投入与平民大众联系更为直接的文化事业，既以此为生，也能够从中寻找人生乐趣与精神寄托。陈栩曾感叹：“案牍劳形，颇复厌苦，愿得沪滨一席地、安笔砚、展琴书，日对良友，以诗词小说唱和，生平之幸也。”随后便结束郁郁寡欢的幕僚生涯，应王钝根之邀而投身《申报·自由谈》担任主笔。许指严也曾在政府中短暂担任机要秘书，但因书生意气而与同僚落落寡合，不久便辞官返沪，专心小说创作。在为官从政与卖文为生中，职业小说家选择了后者，这使他们的社交活动总是刻意保持着与政治的距离。例如由范烟桥发起成立的星社便以谈论文艺，不涉政治为标榜。除星社外，萍社、鸥社、青社等社团同样聚拢着大批职业小说家。这些社团均注重文人之间的联谊，而不以政治为旨归。通过社团活动中的相互引荐，职业小说家为自己的职业发展积累起更为丰富的人脉。原本分散于各个小说报刊的职业小说家群体，也因此交织成一张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

南社在 1912 年前共有社员 206 人，1923 年解体时社员已达到 1110 人，有超过八成的南社社员都是在 1912 年后入社的。1912 年前，南社作为同盟会外围组织，入社需要承担一定的政治风险。1912 年后，南社作为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誉满天下，此时加入南社则可借其声势谋取名利。虽然不能就此认定南社在 1912 年后吸纳的社员都是追名逐利之徒，但社员的入社动机的确由最初的因救国救民而意气相投，变得更加注重现实功利因素。南社的庞大规模蕴含着丰富的人脉资源，这对于亟需扩展人脉的职业小说家无疑有

---

①“它底宗旨是反抗满清，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志了。”柳亚子：《新南社成立布告》，《民国日报》1923 年 11 月 9 日。

②③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3 年，第 482-483 页，第 487-488 页。

④王钝根：《本旬刊作者及诸大名家小史》，《社会之家》第 1 卷第 1 期。

⑤1911 年 12 月 31 日，尤翔、陈嘉猷填写入社书，入社号 205、206，南社在清代的规模定格在 206 人。

⑥1923 年 2 月 13 日，陆鸿填写入社书，入社号 1110，成为南社最后一位社员，南社的规模最终定格在 1110 人。

着巨大的吸引力。1912年后，职业小说家纷纷加入南社[①]，成为南社的重要一极，南社也因此在小说界占据一席之地。职业小说家虽然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融入市民社会，但传统文人的出身使他们仍然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着士大夫阶层的心态与情趣，无论是名士的风流自赏，还是唯美、趋雅的生活情调，都与南社诸子不谋而合。所不同的是，柳亚子等人的狂歌纵酒、放诞不羁夹杂着自身在政治上的失意，职业小说家则对政治缺乏兴趣，他们因共同的价值追求与审美趣味而汇聚，在各自的小圈子中谋求自身的职业发展。职业小说家加入的南社早已告别激昂高歌的革命岁月，蜕变为诗酒风流的文人集会，如同星社等其他社团，只是用来社交的工具。因此，王钝根、周瘦鹃等人在加入南社后，除参加雅集外[②]，无论是对外的力主北伐、反袁护国，还是内部的条例修订、唐宋之争，都鲜有参与。职业小说家被南社吸纳，固然反映了南社在辛亥革命后的崇高声望，但也将南社的松散性暴露无遗。南社到底是一个什么组织？南社的条例中找不到，这样虽可将社会各界人士尽数招揽，但也使各式各样的政治倾向、思想倾向、文学倾向悉数涌入，南社赖以立社的革命底色因此被一次次稀释，最终导致雁影分飞的苦涩结局。南社解体后，职业小说家依然在星社等社团中自得其乐。他们与南社的相遇，犹如一段记忆尘封于南社的历史，等待着后世的发掘与思索。

二、南社小说“南社性”的追寻与《南社小说集》价值的再认知

根据过往研究，原本以诗歌名世的南社能够在小说领域“开宗立派”缘于以下两点。其一，南社社员进行过大量的小说创作。2007年，于润琦发表《南社社员的小说成绩》，经其初步统计：“在南社活跃的一二十年里，有50名社员撰写了不少于500部小说……”[③] 2012年，姜国整理出版《南社小说目录》[④]，共收录99位南社社员所作小说1661篇，其中单行本小说349篇，期刊小说1312篇。这一数据较之于润琦所计增长三倍有余，但仍不免讹误、遗漏之处。例如《南社小说目录》收录姚鹓雏小说60篇，其中《风飑芙蓉记》与《十五年前》为同一篇小说采用不同篇名两次发表，故而实际的小说数量应为59篇。将此数据与王敏《姚鹓雏小说研究》[⑤]附录信息进行比对，仍可补充各类小说40篇，姚鹓雏所作小说由此保守估计已达99篇。姚鹓雏仅为南社小说之一家，若再考虑小说在篇幅上数倍于诗歌，南社小说的体量可谓卷帙浩繁。其二，南社社员掌握着民国初年大量小说报刊的编辑与出版。民国初年，上海地区的各类报刊大都由南社社员主持笔政，甚至于“当时在上海，若不是南社的社员，不大能够进报馆当编辑”[⑥]。就小说报刊而言：包天笑于1909年主编《小说时报》，又先后于1915年与1917年创办《小说大观》《小说画报》；王蕴章于1910年7月创办《小说月报》，并两任主编，许指严、恽铁樵等均为该刊主要撰稿人；1914年，刘铁冷筹办《小说丛报》，由徐枕亚担任主编；1914年6月，王钝根主编《礼拜六》，1916年4月发行至100期后休刊，1921年3月又在周瘦鹃的实际主持下复刊……包天笑、王蕴章、刘铁冷、徐枕亚、王钝根、周瘦鹃等人俱为南社社员，柳亚子多年后曾回忆这一“盛况”：“大家都是熟人，并且差不多都是南社的社友。不是的，也都拉进来了。那时候，可称为南社的全盛时代”[⑦]。

既是主要创作力量，又掌握着重要传播渠道，南社无疑是清末民初小说界的重要一极。但如果南社小

---

①周瘦鹃，1915年5月9日加入南社，入社号508，介绍人叶楚伧。贡少芹，1916年4月20日加入南社，入社号590，介绍人胡寄尘。陈栩，1914年5月4日加入南社，入社号595，介绍人姚鹓雏。闻宥，1916年5月23日加入南社，入社号609，介绍人姚鹓雏。王钝根，1916年6月29日加入南社，入社号634，介绍人朱少屏。

②程善之参加南社第7次、第8次雅集。陆澹庵参加南社第12次、第14次雅集。周瘦鹃参加南社第12次雅集。贡少芹参加南社第14次雅集。陈栩参加南社第14次雅集。

③于润琦：《南社社员的小说成绩》，《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④姜国：《南社小说研究·初探》，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⑤王敏：《姚鹓雏小说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文学院，2012年。

⑥金建陵、张末梅：《南社张素诗文辑存》2000年第7期，第165页。

⑦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2页。

说不再仅仅用作南社社员小说创作的统称，而是对其进行群体性特征的归并，那么这一概念的合理性便值得重新审视。南社社员创作有大量小说并掌握主要小说刊物，固然有着扎实的文献基础进行佐证，但这些证据也仅仅能够说明南社社员在清末民初曾经积极参与过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南社小说既然冠以“南社”前缀，那么所涵盖的小说便应体现出一般小说所不具备的“南社性”，而过往研究恰恰对此有所忽视。其一，所论小说的创作时间与南社的发展历程、社员的南社经历并不契合。例如依据徐枕亚所作《玉梨魂》将南社小说的爱情观定位为“觉世与规避”，认为“南社写情小说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发展状态，在个体自我意识高涨的时代，南社小说家秉承明清之际人性觉醒的传统，又融汇了西方现代性的自由观念”①。《玉梨魂》所叙何梦霞、白梨影彷徨于礼教与情感之间的爱情悲剧的确传达出“觉世与规避”的爱情观，但《玉梨魂》最初连载于1912年《民权报》，徐枕亚加入南社的时间则为1917年8月28日，社员未入社时的小说创作与南社并未发生关联。再看南社社员参与的小说报刊。以创刊于1909年10月14日的《小说时报》为例，主编包天笑于1910年8月加入南社，此时该刊已出版至第五期，那么前五期《小说时报》便同南社社员未入社时创作的小说一样没有与南社发生关联。又如《礼拜六》，该刊于1916年4月出至100期后宣布休刊，主编王钝根在两个月后的1916年6月29日方才加入南社。《礼拜六》后于1921年3月复刊，虽然此时担任主编工作的周瘦鹃已于1915年5月9日加入南社，但南社却在1917年的“唐宋之争”中几近瘫痪，至1921年时已处于解体的前夜。甄别《礼拜六》与南社的关系，惟有将小说杂志的发行过程、相关社员在南社中的活动以及南社的发展历程三条线索综合比较，方可作出冷静的判断。其二，南社对所论小说的思想情感、艺术旨趣并未产生实际影响。苏曼殊于1912年4月5日加入南社，《断鸿零雁记》同年连载于柳亚子等多位南社社员参与编辑的《太平洋报》之中，就时间而论，《断鸿零雁记》当属南社小说。但作为一部“带有自传性质”② 的小说，《断鸿零雁记》抒发的是苏曼殊本人的忧郁气质与情感纠结，哀怨婉转的风韵与南社“以文章气节相尚”的旨趣大相径庭。又如《小说月报》，该刊创刊后明确宣称“本报宗旨以怡情悦性、改良社会为主”③。“改良社会”由“小说界革命”中的小说救国思想沿袭而来，“怡情悦性”则是对小说这一文体审美属性的强调。即便《小说月报》的主创者此后均加入南社，但在办刊伊始确立编辑思想的过程中，南社并未有所参与。可见，虽然南社社员在清末民初小说界颇为活跃，但南社社员创作小说以及编辑小说刊物时大多不以南社的名义进行。诸多南社小说除去作者的南社社员身份，便与南社再无关联，而南社社员又只是入社小说家众多社会身份中无足轻重的一种。在此情况下，倘若不加甄别地将南社社员的全部小说活动一视同仁，那么南社小说势必丧失与其他小说相区别的“南社性”。

《南社丛刻》作为表达社团理念、凝聚社员共识的南社社刊，在南社文学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但《南社丛刻》所录文体始终限于诗、文、词而忽略小说，若想以南社社刊为路径探寻南社小说，便不得不于《南社丛刻》外另觅他处。胡怀琛曾对南社社刊进行梳理：“南社的出版物，用南社名义出版的，始终只有《南社》一种，就是前面所说由编辑员选编的社友之稿。……此外有胡朴安重选的《南社丛选》，他是用私人名义印行的。内容是从第三集《南社》起，至二十一集止，选出一部分……又有《南社小说集》一种，是用南社的名义编辑，而由文明书局出版的（出版在民国六年三月）。”④《南社》即《南社丛刻》，《南社丛选》为其选本，真正以“南社”名义出版的南社社刊实际只有《南社丛刻》与《南社小说集》两种。在《南社丛刻》不收小说的情况下，《南社小说集》便成为唯一收录小说的南社社刊。但《南社小说集》仅仅收录13篇小说与8则小说话，并且所录小说均为不超过千字的短篇，狭小的体量使其屡屡受到相关研究者的忽视。例如姜国所著《南社小说研究·初探》仅于篇末表格《南社小说目录》列有《南社小说集》所收篇目，正文部分具体分析南社小说“爱国观”“爱情观”“社会观”时则选取南社社员的其他小说。单篇论文除兰少成《南社小说浅谈》对《南社小说集》略有提及外，尚无专文进行集中论述。《南社小说集》的狭小体量虽是其无法克服的先天短

---

①郭建鹏：《觉世与规避：南社小说的爱情观》，《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8期。

②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855页。

③《新出〈小说月报〉》，《时报》1910年10月10日。

④胡怀琛：《南社的始末》，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9页。

板，但作为南社发展历程中唯一刊载小说的南社社刊，是南社社员以“南社”之名进行小说创作的唯一平台。因此，若想发掘南社小说的“南社性”，首要需要摆脱因南社社刊所录小说过于薄弱而有意将研究范围外延的固有思路，并把《南社小说集》放置在南社小说的中心位置。事实上，《南社小说集》收录的小说不仅在文体上新旧杂糅，思想旨趣更是批判与消闲兼备，呈现出南社社员小说创作的多元风貌，而其狭小的体量与出版一期便宣告停刊的编辑过程，则客观反映了小说在南社的创作环境中成势而不成派的发展困局。

三、《南社小说集》的多元风貌

《南社小说集》收录的13篇小说中，成舍我的《黑医生》、叶楚伧的《贼之小说家》、王钝根的《予之鬼友》、赵苕狂的《奇症》均为侦探小说。除侦探小说外，南社社员在《南社小说集》中还尝试过其他新式小说。胡怀琛的《黄金》采用的演说体发轫于小说界革命，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曾对这一小说样式进行最初的尝试。但梁启超创作的演说体小说出于传播政治理念的功利性目的，由政治论辩结构全篇，初读虽给人以强烈的新鲜感、震撼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千篇一律的说教对于读者的吸引力却难免“再而衰，三而竭”。胡怀琛的《黄金》更加注重演说辞的生动性、趣味性。为阐明“黄金无用”的道理，作者虚构了一个遍地黄金的“黄金岛”，岛上居民听闻黄金在世俗世界中的昂贵价值后反问：“我们自有衣食，何须以黄金相易？原来所衣所食都是天公生就，供我们使用的，只消我们费工夫去寻觅罢了。譬如天生一种谷和麦，我们费些工夫去耕耘种植，便可为食，何须黄金？又如天生一种麻和葛，我们费些工夫去纺织缝纫，便可为衣，何须黄金？”[①] 不同于《新中国未来记》近乎说教的强行灌输，《黄金》在演说者与听众一问一答的互动中巧妙传递了勤劳为本、自力更生的生活态度，风趣幽默的行文则显示出演说体小说的艺术技法已由最初的板滞呆板渐趋浑然天成。姜可生的《蛇齿》属于对话体小说，全文由慈善家乔纳斯与其子吉姆斯的对话推动情节发展。小说开篇感慨“世道衰微，伦教之不明也久矣”[②]，随后通过人子忤逆其亲的故事警惕世人。这种世俗化的选题同围绕某一政治理念展开的政治小说相比，更加符合当时社会中普通民众的认知水平与阅读心理。在胡怀琛、姜可生等南社社员的实践下，演说体小说、对话体小说等新式小说不仅艺术技法日臻成熟，选材立意也不断贴近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的社会现实，推动了这些小说样式的洋为中用。

贡少芹的《哀川民》曲、白、科俱全，是一出标准的戏剧剧本。《南社小说集》视戏剧为小说的小说观念，在南社社员的文学活动中并非孤例。《觉民》《女子世界》分别由高旭、丁初我主办，高增、陈家鼎、柳亚子曾向其“小说”栏目投稿。但依照现代意义的文体划分标准，高增的《女英雄传奇》《迷魂阵传奇》、陈家鼎的《邯郸梦传奇》、柳亚子的《松陵女儿传奇》都应归作戏曲类的传奇杂剧。此外，王钟麒在1907年发表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类别划分时，于“记事”“杂记”“章回”之外，另设“戏剧”“弹词”二体，并将“马致远之《岳阳楼》，汤临川之《邯郸记》”[③] 视作小说。可见，无论实际创作还是理论分析，南社社员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成员坚持传统的杂文学观念，依旧将小说、戏剧视作文的附庸。虽然这种小说观念略显保守，南社社员创作的小说在内容上却是趋新的。《哀川民》以袁世凯称帝为背景，描述军队进入四川后掠民血汗的残暴，痛斥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觉民》《女子世界》刊载的“小说”，或向往共和，或追求女权，均能紧跟时代的热点话题。王钟麒面对小说界革命对西洋小说的崇拜与效法，力图以中国传统的杂文学观念重新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提出“欲以新小说为国民倡者乎，不可不自撰小说，不可不择事实之能适合于社会之情状者为之，不可不择体裁之能适宜于国民之脑性者为之。”[④] 从而为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回归本土、回归理性奠定了基础。正是凭借对现实社会、时代热点的强烈关注，贡少芹、王钟麒等南社社员以一种古为今用的手法，赋予戏剧等旧式“小说”以及传统的杂文学观念新的生命。

---

①胡怀琛：《黄金》，王文濡编：《南社小说集》，上海：文明书局，1917年。

②姜可生：《蛇齿》，王文濡编：《南社小说集》，上海：文明书局，1917年。

③王钟麒：《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月月小说》1907年10月7日第9期。

④王钟麒：《中国历代小说史论》，《月月小说》1907年10月7日第9期。

在王文濡为《南社小说集》创作的小说话《废物赘语》中，有一则写道："小说以叙述下流社会情况，为最难着笔。非深入其中，深知其事者，断不能凭空结撰，摹绘尽致。"[①] 中国古代的上层文人出于雅俗有别的成见，往往不重视或写不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但在清末民初，科举制度的废除、稿酬制度的成熟等因素催生出包天笑、周瘦鹃、陈栩等职业小说家，身份的转换迫使他们关注、体验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王文濡将"下流社会"视作小说创作"最难着笔"之处，唯有"深入其中，深知其事"方能完成，这一论断既强调了小说的现实性，同时也与清末民初小说家写作视角的下移相互呼应。《南社小说集》收录的 13 篇小说数量虽少，但包含政治讽刺、社会实录、婚恋自由等主题，显示出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

南社元老高旭论及南社立社宗旨时写道："当胡虏猖獗时，不佞与友人柳亚卢、陈去病于同盟会后，更倡设南社，固以文字著革命为职志，而意实不在文字间也。陈、柳二子，深知往时人士入同盟会者，思想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借南社以为沟通之具，殆不得已之苦思欤。"[②] 在这种补同盟会之不足的理念引导下，南社社员的小说创作充满救国救民的革命情怀与强烈的现实性。叶楚伧的《云》讲述袁世凯时期的国会议员无心为民请命，整日悠游狎妓，声色犬马。妓女巧云不畏强权，怒斥议员："君等口衔天宪，手攫金钱，不翅依辈以手口赚游客也！"[③] 议员惊惧之余，"辄举以告同侪，谓勾栏中乃有反封帝制之叛逆。"[④] 王大觉的《红爪郎》以明代士人万龙光对抗魏忠贤阉党为主线，穿插万龙光与妓女柳云娘、侠女红爪郎的情感纠葛，架构起英雄美人的传奇故事。小说结尾发以感慨："挽近士夫，平时遇事，色危相委。及至运局变迁，则又轩眉纷起，攫名也，攘利也，侈功也，惟为一己谋而犹曰：'吾及时图治也，天下从此不可治矣。'欲如红爪郎之临难奋发，敝屣轩冕，更于何处求之哉？呜呼！此其建国五年来之痛感矣！"[⑤]《南社小说集》动议于 1916 年，在此之前，南社社员面对袁世凯践踏共和、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宋教仁、宁调元、陈其美等直接参与武装斗争并相继殉难，林懈、景耀月、汪东等却慑于政治高压而投靠袁氏，直至走向革命的对立一面。柳亚子对林獬等人的变节倍感失落："洪宪称帝，筹安劝进，很有归南社的分子；可是在炙手可热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开口，等到冰山倒了，却热烈地攻击起来。我以为'打落水狗'不是好汉，所以没有答应他们除名惩戒的要求，然而提倡气节的一句话，却有些说不响嘴了。"[⑥]《云》与《红爪郎》或直接就时事发表评论，或以史传笔法进行讽刺，均围绕知识分子的"气节"这一核心话题建构故事框架。叶楚伧、王大觉笔下的巧云、柳云娘虽为妓女，却心忧国事、不畏强权、敢作敢当、百折不挠，这些美好品质既是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期许，也传达出南社经历反袁风波洗礼后重塑"气节"的决心。

阿瑛的《伤心人语》在形式上采用对话体，由伧父与侠君的对话构成全篇。伧父原本是一位"热心为国""热心救世"的热血青年，但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使其愈发悲观厌世，临终前无奈感叹："今日世界人心，可算得坏到极端，真的日少，伪的日多。每日令人疾首痛心的事，实在不知多少！别的不说，即如以先觉自命救世为言的一流人物，不过如同唱悲剧的戏子的一般。上了台时，却是行业所拘，不能不要做出悲悯为怀的形状起来。作伪之习一至于此，其他社会又大略可知。"[⑦] 程善之的《儿时》以第一人称回忆录的方式讲述作者少年时代的教育经历。作者父母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嘱咐子女以求学为念，不必分心家中琐事，但限于认知水平无法提出具体的建议。私塾先生认真负责，教书方式却僵化古板，"好鞭挞叱咤""一字不悉，责手心至十数"[⑧]，以致作者视《尚书》为"恶魔"。《伤心人语》中伧父的迷茫传递出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对于混乱政局的普遍失望。《儿时》的主人公在家庭与学校间的进退失据强烈控诉了旧式教育对人性的戕害。两篇小说均有着强烈的现实性，显示了南社社员的小说创作并未囿于南社内部，而是将笔端触及到整个中

---

①王文濡：《废物赘语》之七，王文濡编：《南社小说集》，上海：文明书局，1917 年。

②高旭：《〈无尽庵遗集〉序》，郭长海、金菊贞编：《高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512 页。

③叶中泠：《云》，王文濡编：《南社小说集》，上海：文明书局，1917 年。

④叶中泠：《云》，王文濡编：《南社小说集》，上海：文明书局，1917 年。

⑤王大觉：《红爪郎》，王文濡编：《南社小说集》，上海：文明书局，1917 年。

⑥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01 页。

⑦阿瑛：《伤心人语》，王文濡编：《南社小说集》，上海：文明书局，1917 年。

⑧程善之：《儿时》，王文濡编：《南社小说集》，上海：文明书局，1917 年。

国社会。

南社成立之初便以“同盟会宣传部”自居，以同盟会会员为代表的革命者群体是南社最初的骨干力量。随着周瘦鹃、许指严、陈栩、徐枕亚、赵苕狂等职业小说家陆续入社，这些以卖文为生的“新”南社社员为南社文学激昂的革命豪情注入了柔情缱绻的消闲元素。周瘦鹃的《自由》以一对大学时代相恋的情侣——张俊才、沈淑兰为主角。两人因毕业分离，沈淑兰嫁与林伯琴为妻。张俊才意外担任林伯琴的助手，与沈淑兰重逢，旧情复燃。但二人顾及道德礼仪，始终压抑着自己的情感。林伯琴知情后，非但不嫉恨发怒，反而诚心祝福张、沈二人重谱恋曲。最终林伯琴因醉酒坠楼身亡，张俊才、沈淑兰二人悟彻红尘，双双进入天主教堂修道。闻野鹤的《媒毒》讲述钱志远与沈韵倩青梅竹马，私定终身。媒婆史媪却乱点鸳鸯谱，致使两方家长强迫钱志远、沈韵倩分别与张绣碧、殷鉴冰结婚。最终，沈韵倩在越窗逃婚中身亡，钱志远则一病不起。周瘦鹃、闻野鹤于南社社员外的另一身份是鸳鸯蝴蝶派的主将，《自由》《媒毒》虽收录于《南社小说集》，仍难免鸳鸯蝴蝶派小说编造爱情悲剧的痼疾。但就思想旨趣而言，两篇小说又与一般意义上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有所差异。《自由》中的张俊才、沈淑兰虽然两情相悦，却能够坚守道德底线而不越雷池，林伯琴更是豁达地玉成二人，张、沈、林三人间的情感纠葛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发乎情，止乎礼义”，更非老套的三角恋，读者读后体悟到的是爱情的圣洁与人性中的理性因子，而这恰恰是热衷爱情描写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所不具备的。《媒毒》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归因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姻，虽然情节略显生硬，但与鸳鸯蝴蝶派小说以一种缺乏社会因素的偶然事件生编硬造爱情悲剧相比，其立意显然更高一筹。可见，周瘦鹃、闻野鹤等鸳鸯蝴蝶派成员一旦以“南社”之名进行创作，无论是作品的思想立意，还是情节建构，他们都有意与自己平日用以谋生的商业化小说创作有所区别。

在周瘦鹃为南社社刊的投稿中，除《南社小说集》的《自由》外，另有组诗《新情歌》发表于 1916 年 11 月出版的第 19 集《南社丛刻》。《新情歌》共 8 首，均为五言四句的短篇。周瘦鹃在诗中以一位女郎的口吻，尽述自己的家国情怀。例如第一首：“阿侬有情人，情人即祖国。侬愿为国死，死后有愉色。”① 又如第五首：“郎本爱国者，忍使国蒙耻。弹丸掷与郎，算妾相思子。”② 革命是南社的底色，因而周瘦鹃为南社挥毫泼墨时满怀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但周瘦鹃本人又是一位坚定的唯情主义者，以致慷慨赴死的勇烈在落笔成文的一刹那不自觉地软化为男女之间的柔情缱绻。尽管趣味主义、金钱主义的烙印使周瘦鹃等人无法像宁调元等革命志士那样唱出“千古南冠泣楚囚”③ 的豪迈战歌，但在南社革命氛围的熏陶下，这些依靠创作小说谋生的职业小说家依然以革命与柔情交织缠绕的艺术创作表达着真挚的爱国热忱。他们的到来为南社略显僵硬的革命情怀注入了柔情似水的消闲元素，南社小说的艺术风貌由此更为立体。

四、《南社小说集》的成书与停刊

《南社小说集》的成书是小说家群体在南社中不断壮大的结果。南社最初的核心成员是陈去病、高旭、柳亚子、朱锡良等以同盟会成员为代表的革命者。包天笑、叶楚伧、胡怀琛、苏曼殊等小说家虽是南社早期社员，但入社时多为革命报刊的编辑，如叶楚伧主编汕头《中华新报》，包天笑主办《苏州白话报》，胡怀琛与柳亚子共同创办《警报》等等。包天笑等人以革命者而非小说家的身份加入南社，使小说家群体在南社早期发展过程中仅仅作为一股潜在力量暗伏于主导南社话语的革命者群体。南社在 1913 年至 1916 年间经历反袁风波后，一方面是参与武装斗争的革命者相继殉难，另一方面是来自社会各行各业的新社员不断加入。在此期间，许指严、周瘦鹃、陈栩、徐枕亚等以小说创作为生的职业小说家陆续入社，先期加入的包天笑等人也将个人精力由革命斗争转移至小说刊物的编辑，开始更多地以小说家身份行世。南社中的小说家群体由此摆脱之前的隐秘状态而成为南社人员构成的重要一极。1916 年 6 月 25 日，姚鹓雏在《民国日报》

---

①周瘦鹃：《新情歌》，柳亚子等编：《南社丛刻》，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 年，第 4752 页。

②周瘦鹃：《新情歌》，柳亚子等编：《南社丛刻》，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 年，第 4753 页。

③宁调元：《丙午被捕作于巴陵县署》，柳亚子等编：《南社丛刻》，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 年，第 819 页。

中发表短文："《南社》有增刊之作，将集合社中人之好为稗官家言者，各出所著，都为一集，此社中向来所无也。晚近文字，庞杂猥下，尤以小说为甚。我侪所作，虽无大过人者，其立意修辞，一衷醇雅，固可冀也。愿我社友，有采斯言。"① 南社中的小说家群体随着规模不断壮大而产生身份认同感，进而试图向外界宣示自身的存在，编写《南社小说集》成为实现这一诉求的具体实践。

《南社小说集》的13位作者中，王钝根、周瘦鹃在清末民初小说界最负盛名。1914年6月，二人共同创办《礼拜六》。在近两年的办刊过程中，周瘦鹃为《礼拜六》创作小说80余篇，王钝根亦发表有10余篇小说。除王钝根、周瘦鹃外，叶楚伧、姜可生、胡怀琛、闻野鹤4位《南社小说集》作者均为《礼拜六》创作过小说。其中，叶楚伧的寓言小说《陈大夫移宫记》四个月间连载10期，姜可生的侠情小说《剑胆箫心》更是连载32期，持续一年四个月。以《礼拜六》为平台，《南社小说集》实现了作者群体的初步汇聚。南社雅集是集合《南社小说集》作者群体的另一途径。自姚鹓雏发出倡议到《南社小说集》成书，南社共举行第15次、第16次与临时第4次共3次雅集，姜可生、叶楚伧、戚舍我、闻野鹤4位《南社小说集》作者参与其中。1917年4月15日，南社举行第16次雅集时委托王文濡编辑《南社小说集》。王文濡不负众望，当月便将周瘦鹃等13位南社社员提供的13篇小说以及自己撰写的8则小说话编辑成书。南社元老蔡冶民题签"'临时增刊'《南社小说集》"。1917年4月15日，《南社小说集》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发行。

除周瘦鹃等参与《南社小说集》撰稿的13位小说家外，周桂笙、包天笑、许指严、陈栩、徐枕亚等小说家同样加入过南社。这些南社社员或亲自主办小说报刊，或担任小说报刊的编辑和撰稿人，帮助南社在清末民初小说界站稳脚跟。但南社尽管招募了大量小说家，除编写《南社小说集》外，再未有冠以"南社"之名，经南社组织进行的集体小说创作。《南社小说集》的成书弥补了《南社丛刻》拒收小说的缺憾，使南社文学体系趋于完整，然而其收录的13篇小说与8则小说话远远无法代表南社社员在清末民初小说界的巨大成就。

南社成立于1909年，众多南社社员早在1902年小说界革命前后便已投身于小说的实际创作与理论建设。针对小说界革命重政治而轻文学的弊端，黄人旗帜鲜明地指出："小说者，文学之顷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② 此后，上海等近代大都市的畸形繁荣催生出以消闲娱乐为取向的创作思潮，小说在其诱导下逐步沦为博人一笑的娱乐工具。有鉴于此，姚民哀为《小说季报》作序时大声疾呼小说创作不应放弃"文以载道"的传统："河山萧索，世变已亟。《易》曰：'天地闭，贤人隐。'《传》曰：'《诗》亡而后《春秋》作。'今《春秋》已亡，则吾侪有笔有舌，岂终甘喑哑以死？不托之于说部，赴将奚托！"③ 小说界革命到新文化运动的近二十年间，南社社员面对小说的政治功能与消闲取向做出了两次不同的选择。在对小说界革命的纠偏中，南社社员成功唤醒小说娱人心性的消闲因子，南社因此成为清末民初小说界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但面对趣味主义、金钱主义主导的商业化小说大潮，南社社员重拾小说政治功用的努力却未能取得预期效果。1917年成书的《南社小说集》正是南社社员在消闲与政治间进行第二次选择时，试图重拾小说政治功用的产物。王文濡在《南社小说集》的跋语中写道："佥谓棣通风气，棒喝社会，文字之最有力者，莫如稗官家言。"④ 就征集到的小说而言，除《黑医生》等侦探小说现实意味稍弱外，《云》《红爪郎》《哀川民》等小说确乎达到了"棣通风气，棒喝社会"的标准。但这份最能展示南社社员小说创作风貌的官方社刊，仅仅出版一期便宣告停刊。

回溯小说从小说界革命到新文化运动近二十年间的演进轨迹可以发现，小说作为审美的文学作品，与政治原本分属两个并不相干的领域，但在清末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下，小说与政治渐行渐近，直至于"小说界革命"这一节点发生交汇。小说借助政治提高自身在中国文学体系中的地位，政治则通过小说扩大宣传。就此而论，小说界革命对于小说的无限推崇是中国小说发展至清末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然而一旦小说与政治实现了彼此的诉求，便又各自循着原本的发展路径分道扬镳。可见，南社社员于小说界革命后重

---

①姚鹓雏：《艺文屑》，《民国日报》1916年6月25日。

②黄人：《〈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1907年2月第1期。

③姚民哀：《〈小说季报〉序》，《小说季报》1918年8月1日第1期。

④王文濡：《〈南社小说集〉跋》，王文濡编：《南社小说集》，上海：文明书局，1917年。

拾小说消闲元素的选择，是理性判断清末最后十年间小说与政治由碰撞到分离演进轨迹的顺势而为，再加上周桂笙、包天笑、黄人等在小说报刊领域的辛勤耕耘，因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面对小说在民国初年陷入趣味主义、金钱主义的泥潭，南社社员试图通过重新唤醒小说“棣通风气，棒喝社会”的政治功用来应对消闲过度的不良创作风气。但除《南社小说集》收录的《云》《红爪郎》《哀川民》等少量小说外，南社社员却鲜有能够真正贯彻这一意图的小说创作。

小说界革命中力挽狂澜的南社社员，为何会在短短二十年后需要再次挺身而出时显露出后继乏力的颓势？身份的转换是极为重要的原因。在对小说界革命进行纠偏时，南社尚未正式成立，因而周桂笙、黄人等南社社员能够从文学的视角出发，以一位职业小说家的身份做出理性的判断。当他们正式加入南社后，在具体小说创作中，尤其是向《南社小说集》这样的南社社刊投稿时，便不得不基于南社社员的身份，将南社的立社宗旨考虑在内。“民族主义和几复风流的文化精神是南社在民国前的精神支柱和社团灵魂；辛亥以后，反袁、反复辟继之又成为凝聚南社的核心和南社高扬的旗帜。”[①]《南社小说集》于 1916 年筹划之时，叶楚伧、王大觉等人尚可借助反袁斗争的余音创作出《云》《红爪郎》这样的小说，从而重申小说的政治功用，并与南社的革命情怀形成呼应。但当反帝、反袁两大政治目标全部实现后，南社由革命文学团体转变为单纯的文学社团，南社领袖柳亚子与其他南社社员对此并未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1917 年，南社爆发“唐宋之争”，一场关于诗歌宗法的文学论争尚未进入诗学、诗理的讨论，便演化为人身攻击乃至驱逐社员的行为，南社随之名存实亡。受此波及，《南社小说集》仅仅出版一期后便无奈停刊。更为致命的是，王文濡提出的“棣通风气，棒喝社会”这一足以引领民初小说重回正轨的小说创作思路，由于南社社团运作的瘫痪而无法做出进一步的理论整合与实际动员，南社社员的小说创作自此陷入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困局。程善之、胡怀琛等南社社员通过创作《儿时》《黄金》等由社会现实问题生发而成的小说，在反清、反袁的革命宗旨外另寻重拾小说政治功用的良方，终因失去《南社小说集》这一发表平台而无法在南社中进行推广。周瘦鹃、包天笑、徐枕亚等职业小说家出身的南社社员缺少了南社革命氛围的熏陶，重新回归商业小说创作而与鸳鸯蝴蝶派合流。南社解体后，柳亚子对南社盖棺定论：“它（南社）不能领导文学界前进的潮流，至为五四以后的新青年所唾弃。”[②] 南社社员在清末民初小说界的聚散浮沉成为这句感叹的注脚。

On the Novel Writing of Nanshe

——Centered on *Nanshe Novel Collection*

WANG Shuang-teng

(Department of Basic Courses, Shandong Police College, Ji'nan 250200, 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f Southern Society neglect the Southern Society character of research target due to the vague definition of concept. *Nanshe Novel Collection* as the only Nanshe formal periodical which publish novel provide a platform for novelists who join Nanshe to write and publish novel which named for Nanshe. The novel class of Nanshe Novel Collection blending of the old and new ideas and its content ha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facts, which present the revolutionary feelings and leisure elements of Nanshe novel.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novelists in Nansh facilitate the appearing of *Nanshe Novel Collection*. The ending of Nanshe Novel Collection owe to the immaturity of Nanshe as a literature club.

Key words: Nanshe; Nanshe members; *Nanshe Novel Collection*; novel

[责任编辑　唐音]

①孙之梅：《南社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年，第 361 页。

②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250 页。